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二十世紀俄國思想家之一

索爾仁尼琴的遺產及其意義

□劉文飛

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去世在最近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這個事實本身就已論證了他的不朽。布羅茨基說：「當我們閱讀一位詩人時，我們是在參與他或他的作品之死亡。」而在索爾仁尼琴這裡，當我們談論他的死亡，我們也就是在探討他的永生，換句話說，也就是在探討他的文學和思想遺產對於俄羅斯民族和整個世界而言的價值和意義。

受難的先知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1918年生於羅斯托夫州，在他出生前六個月，他的父親在一次打獵中意外身亡，由於母親出身富農，相依為命的母子在當時的社會中備受歧視，甚至曾棲身馬廄。1941年，索爾仁尼琴從羅斯托夫大學數理系畢業，在一所炮兵學校經過短暫培訓後走上戰場，他作戰勇敢，兩次獲勳章，並晉升為大尉。1945年2月，因為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了對斯大林不敬的話，索爾仁尼琴在前線被蘇軍偵查機構逮捕，後被判處8年監禁，先後在蘇聯的多個集中營中服刑。1952年，索爾仁尼琴患上癌症，醫生斷言他只能活幾個月，但是，在不可能獲得精心治療的情況下，犯人索爾仁尼琴的絕症卻奇跡般地徹底痊癒了，索爾仁尼琴後來將此視為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讓他替衆多的冤屈者道出集中營的實情。1953年服滿刑期後，索爾仁尼琴被終身流放至哈薩克斯坦，在當地一所學校任教。在「解凍」之後的1956年，索爾仁尼琴得到平反，在梁贊州一所鄉村學校中擔任物理、數學老師。

1962年，索爾仁尼琴因為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走紅文壇，但是好景不長，他深挖體制牆腳的做法很快就為當局所不容，在「解凍」之後復又「停滯」的時期，他被打入冷宮，在1966—1989年的二十餘年間一直無法在蘇聯發表任何作品。在他將作品送往境外發表之後，尤其是在他於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承受到了當局越來越大的壓力。1974年，他再次被捕，第二天即被驅逐出境。他先到西德、瑞士等地，後定居美國。在度過了二十年漫長的流亡生活之後，他才於1994年回到祖國。

遭腹子，單親家庭，出身不好，戰爭，被捕，集中營，癌症，流放，被逐，二十年的流亡……這便是索爾仁尼琴的生活軌跡。這樣的經歷與俄國人心目中的「受難者」形象太吻合了，加之他又在不懈地將自己的苦難結晶為文學作品，不懈地利用他受難者的身份發出各種預言，終於使他贏得了「文學主教」和「思想聖徒」的光環。俄國人同情弱者，更同情受難的文人；俄國人崇拜天才，更崇拜殉道的先知。將這些身份合而為一的索爾仁尼琴，於是就成了20世紀下半期俄國的一個精神偶像。

長於世紀的「一天」

發表於1962年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標誌着索爾仁尼琴作為一位作家的誕生，無論是在他本人的創作還是在整個20世紀的俄國文學史中，這部作品都佔據着一個顯赫的位置。《一天》是在蘇聯公開發表的第一部以蘇聯集中營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開了所謂「集中營文學」的先河，為俄國文學中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在20世紀下半期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一天》只寫了舒霍夫和他的獄友們短暫的「一天」，但這「一天」卻構成了20世紀俄國文學中的整整一個時代。

首先，在索爾仁尼琴本人的創作中，《一天》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奠基之作，它似乎勾勒出了索爾仁尼琴之後創作的發展軌跡，為他的美學風格確定了一個基調，他後來陸續發表的重要作品，如《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島》和《紅輪》，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說是《一天》的延續或變奏。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是面向現實的，其唯一的主题可以說就是俄羅斯民族在20世紀的歷史命運，作家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對俄國革命的產生、性質和歷史進行深入的思索，藝術地再現了個人與體制、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對峙、衝突及其內在邏輯性。他一個人的創作，似乎就構成了整個20世紀下半期俄國文學歷史的一個縮影，一種象徵。值得注意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授獎給索爾仁尼琴，就是為了表彰「他在傳承俄國文學傳統時表現出的道德力量」。換句話說，索爾仁尼琴的文學史意義，就在於其對俄國文學傳統的「繼承」，在於其「道德力量」。而《一天》，正是發端於20世紀中葉的這一俄國「新」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石之一。

其次，《一天》之所以具有「長於世紀」的生命力，可能還在於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史意義。舒霍夫是蘇聯時期集中營裡一個普通的囚犯，正是這個普通人的「普通」遭遇，以及他對於這種遭遇的「普通」態度，才構成了這個文學形象的普遍意

義。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此刻舒霍夫一無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時間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長，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現在他覺得能熬過去！謝天謝地，能熬過去，能熬到頭！」舒霍夫的態度似乎在傳達這樣一個命題：對苦難的忍受也表現為一種尊嚴，面對不公正的命運，活下去就構成一種抗議，一個勝利。除此之外，《一天》或許還具有某種更為概括、抽象的象徵意義。舒霍夫在集中營裡度過的「一天」，也完全可能以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為我們所遭遇。生存的艱難，環境的壓力，人與人之間的不理解和隔膜，甚至敵意和殘忍，——所有這些並不僅僅存在於集中營的高牆或鐵網之內，我們甚至可以說，「集中營」或許是無處不在的，我們的每個「一天」或許也同樣都是與環境和命運的抗爭，因此，《一天》或許並不僅僅是寫給某個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讀者看的。每個看重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人，每個身處逆境卻依然不屈服於命運的人，都一定能在索爾仁尼琴的《一天》之中獲得慰藉和啓迪。

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

索爾仁尼琴是一位「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作為蘇聯炮兵軍官的他，卻敢於對最高統帥斯大林說長道短，並因此惹火燒身；《一天》發表後，他受到赫魯曉夫和官方的空前重視，甚至被列為蘇聯最高獎別率獎的候選者，但不善於見風使舵的他終於被驅逐出境；到了美國之後，他並沒有因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卻很快就批評起了「惟利是圖」的美國社會和美國式的價值觀來，在著名的《哈佛演講》中，他甚至稱美國為「惡的帝國」，引得美國當局和許多美國人對他大為不滿，很快就被當成了一個「忘恩負義的孤僻老頭」。

1994年，索爾仁尼琴豪華的、凱旋般的歸來曾轟動整個俄國，而俄羅斯人衆星捧月式的歡迎也讓他有些飄飄然，回國之後，他頻繁地會見記者，多次發表電視講話，還在俄國各地「視察」，宣傳自己的主張和理想。他以及他的擁護者們都以為，他們的政治理想就要實現了，俄國將迎來一個政治的春天。但是不久，人們不無驚訝地發現，這位智者又一次成了「持不同政見者」，他對現實社會不滿，對當政的統治階層不滿，經常公開抨擊葉利欽等人。在他80歲生日時，他公開拒絕了葉利欽頒發給他的聖安德烈勳章，並稱他「不能從一個將俄國帶入當今災難的最高權威那裡接受獎賞」。普京時期，索爾仁尼琴與當局的關係似乎有所緩和，很多媒體都刊登過普京與索爾仁尼琴握手的那幀照片，但就在這張照片上，面帶微笑的索爾仁尼琴在接受普京的祝賀時卻並沒有站起身來，這似乎讓人能從中感覺到某種保留態度，因為，普京對抗西方的外交政策固然能贏得索爾仁尼琴的稱讚，但是普京竭力強化中央集權的國內方針卻未必會得到索爾仁尼琴的肯定，因為索爾仁尼琴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恰恰就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民主，是地方自治，是「人民的自我管理」。

就這樣，無論何時何地，索爾仁尼琴似乎都形成一個抗議，構成一種挑戰。對於一位真正的社會思想家來說，這種姿態與其說是一種刻意營造的自我表現，不如說是其人格和思想之內在驅動的結果。這種對峙的姿態，往往比具體道出的話語更有意義。在每個國家和每個時代，附庸主流意識形態的都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掌握着「部分真理」的「思想異端」，其存在便顯得更可貴了，它至少可以維繫社會思潮的平衡。也許，與權力保持對峙，至少是保持距離，才是真正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應該採取的最佳位置；也許，思想和文化只有在與政治的衝突中才能體現其意義，豐富其內涵，並煥發出真理的光輝。

索爾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義」

在蘇聯解體前後的20世紀90年代，面對持續動盪的俄蘇社會，索爾仁尼琴進行了深刻的思考，並相繼寫出了他的「政論三部曲」，即《我們如何安置俄國》、《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和《傾場的俄國》。在這三部政論性小冊子中，索爾仁尼琴似乎已經不滿足於通過文學作品體現其思想觀點的「間接」手法，而乾脆直抒胸臆，就事論事，對俄國的歷史和現狀、特性和命運，乃至問題和藥方，都給出了獨到的論述，較為集中地表達了他的「新斯拉夫主義」的思想。

索爾仁尼琴的三部政論作品有兩個貫穿的思想，一是對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導，一是對俄羅斯民族特性的強調。實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民主，這既是索爾仁尼琴給出的改革出路，也是他政治主張的核心。他認為，俄國的力量、精華和希望，全都積澱在俄國的深處和底部，只有從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發，體現最普通人民的願望，俄國的復興才有希望，俄國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文化獨特性與發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顯。在談到俄國的歷史和現實時，索爾仁尼琴往

小路彎彎曲曲，誰也不知道它在這兒躺了多久。它瘦瘦的，不肯說話，默默地像在等待着什麼。

就在碎石子小路的身旁，一群柔黃色小花，不知何時從狹隙中搖搖擺擺地生長出來。一叢叢，細小嬌柔，燦燦然洶氣中帶着聰慧，悠悠然頑皮中攜着靈氣，你挨着我，我擠着你，擺動腦袋旋轉身姿，就像在天橋上走貓步的女郎，踩着風的旋律，載歌載舞。

停住步，不由得想多看一眼。山遠了，水遠了，一切都遠了，只有滿目燦燦的黃，柔柔的綠，風沙沙地吹哨子一般鼓動耳膜。

這是夕陽播下的種籽嗎，還是夜風遣來的使者？沒有煩惱，也沒有憂傷，齊齊地仰着臉喃喃地唱呀，熱烈地揮着手搖呀搖——那開幕禮的飛人太眩目，那閉幕式的禮花太耀眼，而你呢，這一瞬已夠我心動。

快樂是真切的不需向人證明；幸福是自足的，不用告知天下。你是那樣的滿足，安然，而且美麗——而我竟叫不出你的名字。

真是委屈了你。我就那樣站着，被你小小的生命感動。有一些名詞與偉大聯在一起，我卻不能動；有一些平凡與微小繫在一起，卻令人為之動容。一些人為偉績豐功沾名釣譽，我則讚嘆那些不曾屈服的卑賤的生命——代又一代。

所有的生靈都值得尊重，世界是一個平台，展現着所有的上帝所賜的生命。一如你，無名的小花。你是否知道，在一個清朗的早晨，你以微小之姿態，撥動了一個卑賤者的心弦。

隨筆二則

□韋 婭



一、清晨看到北極熊

清晨看到牠的圖片，不，是牠們，北極熊們。在海水中。

牠們終於落入了海中，北極的融化已在此刻。報紙就這樣，把一個又一個憂愁帶給我，如此殘酷地開始着我的白天，許多個，無數個。

而今天，我則為牠們潸然淚下。我知道還有許多個有關牠們的消息，將會接踵而至。自從我得知北極的融化已加速了步伐，從上一個世紀到本世紀中，從本世紀中到即將到來的今年9月，我就已經在提心吊膽中度日了。心下希望一切都不要是真的，或者它會遲一點到來……

可是，它們來了。非常準時地到來——消息如此真切。

我會不會得憂鬱症呢，如果我得憂鬱症而能解救牠們的話，那就讓我得吧。如果我的淚可以給牠們以生路，那就哭吧！

而我知道不能，都不能。於是我忍着淚，就這樣端視着牠，一隻刊在報頁上的跌入大海的北極熊。岸是那樣遙遠，牠們游不到。九隻，不，說還有數十隻，在另一些海域漂浮。

我能做什麼呢？許多聲音曾經呼喚過，許多好心人曾經努力過，可是這些細微的聲音和力量拉不住世界的下滑的瘋狂速度，貪婪的慾望遮蔽了人類的良知，競爭

啊，搶奪啊，享受啊，揮霍啊……

獵人曾這樣逮獲北極熊：誘引牠們舔食裹着鋒利刀尖的冰塊。鮮紅的血是這樣的好吃啊！人類現在也正是這樣一隻巨大的舔着自己鮮血的北極熊——我們在吃自己的地球，我們在毀自己的家園，好鮮美的味道啊——

把天空燒出一個大窟窿吧！讓北極南極極融吧！把地底海底掏空吧！讓森林山野變禿頭吧！我們要喝我們要醉，我們要搶我們要鬥。你的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不要和平不要安寧，什麼自由民主，什麼普世價值，什麼佛教基督，我們要聖戰要殺人要殺……什麼北極熊，去牠的！我哭，哭我的地球，我的北極熊。

二、細細碎碎的黃花

在海浪拍打着堤岸之外，濃鬱的竹林正在閱讀着晨曦。

——有一條誰也沒有留意的碎石子小路，仍在寂寂地睡着。



鄭樹森題贈本

□古 劍

《遠方好像有歌聲》鄭樹森在讀書界可能不那麼有名，在學界還是很有名氣的。他是比較文學專家。

鄭樹森在外國時交遊廣闊，博覽中外文學作品、關心世界文壇動態是他例行的功課，因此，請他撰寫作家報道是台灣聯合報雜誌首選的人物。鄭最大的本事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公布，他的專稿就到了報館案頭，配合評介第二天就見報，展現在讀者眼前。十年如此，為人樂道。如此快速，可知平時閱讀之勤、涉及之深、交遊之廣。

他這本譯詩集，可證其「橫掃」式的閱讀面。包括希臘、波蘭、羅馬尼亞、德、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伊拉克、尼日利亞、南非、瑞典、美國、聖路西亞、墨西哥、阿根廷的詩人，很多是不大出名的詩人。

這樣的人當然是愛書人。2003年他寫了一篇《文章有價書無價——美國的書市及善本書》，我讀得興味盎然，連讀兩遍。他談起美國書市，頭頭是道。他說：很多賭徒有所不知的是，其實書一樣可以「下注」，而且和賭馬不相上下，有熱門冷門之別，也同樣講究眼光。

還說進入書市，一如投入股市，挾巨資入市不擔保就有斬獲。不用說他是入過書市的。不過，後來1980年覺得不免「玩物喪志」，將舊書和名家翰墨全部出清，金盆洗手了。在他的《縱目傳聲》散文自選集中，還有篇《名家書信價多少？》亦可讀。

鄭樹森對香港文學史料很關注，曾與黃繼持、盧瑋瑩三人編輯出版了《香港新文學年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為香港文學史料做了搜集和梳理的工作，也為香港文學史未來的撰述者作了些準備，誠有心人也。

寫香港報紙專欄，看似容易，初出道卻常被「考起」。近來鄭樹森就險些被難倒，他不像劉紹銘少年時練過「童子功」，於是忙向劉教授「取經」。劉紹銘雖有「童子功」，但以教授身份重出江湖，腹中學問多，又聲名在外，豈能苟且，畢竟久疏戰陣，「起初二星期三，筆瀉千里，第二天重讀，確有冗詞贅語，乃手起「筆」落，——清除。可是再算字數時，仍有盈餘，不得不狠心削肉。此中慘況真不足為外人道。」

鄭樹森又如何？且聽劉紹銘道來：「最近鄭樹森教授應小董之邀作一次「客座隨筆」，老友不棄，以初稿和定稿示我。千餘字削為八百字，其削之深可想而知。樹森附言曰「客座」一次後，開始對我們專欄「寫稿佬」有幾分「敬意」。鄭公子好說，好說。」

（《作家題贈本》之三十六）